

# 逸园影印洪武本《书史会要》考

张 金 梁

陶宗仪《书史会要》是古代书法史中的经典著作，其初刊洪武本早难寻觅。1929年武进陶琪影印了称之为洪武本者，多年来人们深信不疑。但对其内容仔细审读，发现其中问题颇多。故加以分析探讨，以辨真伪。、

—

陶宗仪，字九成，浙江黄岩人。生于元延祐三年（1316），约卒于永乐元年以后，<sup>①</sup>是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其所著《书史会要》（以下简称《会要》）凡九卷，“起自三皇，迄于元季，摭采至为繁富，文笔简当，间加评论，褒贬颇得其平。”<sup>②</sup>被研究书法史者捧为圭臬。其版本流传，余绍宋谓有“明洪武九年原刻本、四库文澜阁本、三续百川学海本”；<sup>③</sup>《中国书画全书》题解谓有“元刻巾箱本、明洪武间刊本、崇祯间刊本、八千卷楼藏抄本、三续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影印洪武刊本等”。<sup>④</sup>

元刻巾箱本《会要》，罕见流传。从洪武本《会要》宋濂叙“天台陶君九成新著《书史会要》成，翰墨之家竞欲观之，以誊抄之不易也。共契诸梓，而以首简授余叙”<sup>⑤</sup>看，此时其书应为新著初刊。故不知元刻本之说从何而来，是否有细笔微书节抄本刻印流传也未可知。其他如八千卷楼抄本、百川学海本等也难睹珍颜。现在流传

《会要》，源头有二：一是四库全书本。《提要》云：“据孙作《沧漂集》所载宗仪小传，称《书史会要》凡九卷。此本目录亦以书法补遗共为一卷，而刊本乃以补遗别为卷，又以朱谋璽所作续编一卷，题为卷十，移其次于补遗前，殆谋璽之子重刻是书，分析移易，遂使宗仪之著中断为二，今仍退谋璽所补自为一卷，题为‘续编’以别于宗仪之书。其书法、补遗仍合为一卷，则篇页稍繁，姑仍统鉤所编别一卷，以便省览。”<sup>⑥</sup>可知编纂四库全书时，《会要》版本有非刻本（当为抄本）及朱氏合刊本两种，四库本《会要》则取舍于朱氏合刻本。当时以朝廷之尊，只能看到明末朱谋璽的合刻本，且《续编》之中有残缺，便知不仅洪武本早已罕见，而明末朱氏合刻本也流传稀少。近人余绍宋亦有“是书明刊本极少见”<sup>⑦</sup>之叹；二是影印洪武本。其出现较晚，武进陶珙在1929年作跋朱色影印，罗振玉篆书题署，书牌为“己巳夏武进陶氏逸园景刊洪武本”。1979年上海古籍书店有复印本发行，后重排者如比较权威的《中国书画全书》等，皆选此本。

逸园影印本《会要》后有陶珙跋，为我们了解此书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方便，其文云：

“陶九成《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刻于明洪武九年丙辰，后朱谋璽加入明代书家，成续编一卷，附九卷之后。而以补遗置卷末，刻于崇祯三年庚午，至顺治十六年己亥，其子统鉤复刊行之，九成原著遂为世所罕睹，四库全书据朱谋璽本著录，可知当时已不易搜集矣。此原本为罗雪堂先生所藏，审系洪武初印，惟阙卷首及卷三，复由傅沅叔先生辗转假得全帙，景写付梓，始成完书。尝于朱谋璽刊本对校，知朱本讹夺触目皆是。其尤甚者，如卷七刘桢下，少胡长孺、周伯琦、胡益、熊朋来，袁袞、郑瑶、章德懋、陆友、钱良右、钱達、罗元十一人；邬进礼下，少周砥、宋克、杨基、卢熊、宋璲五人；陈睿下，少朱芾、陈璧二人；补遗少詹希源、顾禄、滕权、宋广、危瓛、端木智、胡俨、

释永芳、永杰凡九人。卷四刘沆作刘沈……之类不胜枚举。衰病侵寻，不能详校，爰就所知，附志简末，以俟博雅君子审正焉。庚午长夏逸园居士陶珙。”

由此可知此本《会要》，是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的家藏。所言“审系洪武初印”鉴定者，应该是藏者罗氏及刊印者陶珙无疑。陶珙并以此本对比四库本《会要》研读多有发现：最重要者是此本元代部分多出了许多书家；其次是纠正了四库本不少错字，为充分证明此版本的特殊价值付出很大努力。

清末学者杨守敬出使日本时著《日本访书志》，曾记载在东瀛看到《会要》情况：“此为洪武九年刊本，首宋濂序，次曹睿序，次孙作《南村先生传》，次引用书目，次九成自序，次考次详考目录凡九卷、补遗一卷。未有郑真跋，卷首题《书史会要》卷之一，次行题南村居士陶宗仪九成著。每卷之后题助刻人姓名四五人，合之共数十人。按宋潜溪序云：‘天台陶君九成，新著《书史会要》成，翰墨之家竞欲观之。以誊钞之不易也，共契付梓’云云，则知此书为翰墨家刊行者。第九卷末题：‘张氏以行成管刻此卷，’又云：‘补遗一卷嗣后刊行。’则知补遗之刊又稍后于九卷。《提要》因孙作《小传》为九卷，遂疑原本以书法为一卷，而以重刻本之补遗别为卷者，为朱谋壘之子统鉉所分，不知原本补遗各为卷，孙作小传载未详言之耳。”<sup>⑧</sup>杨氏在日本所看到的洪武本《会要》，其中书法、补遗各自成卷，并提出“补遗之刊又稍后于九卷”的结论，比较合理。

逸园本《会要》，内容排列是：宋濂序、陶宗仪自序、曹睿序、引用目录、正文九卷、补遗一卷、考详、孙作《南村先生传》、郑真后序。与杨记对比，二者版本不同。从书序排列上看，杨氏所记较为合理，一般所约之序，都在自序之前。从内容上看，逸园本在补遗后多出“考详”一节，其格式为：首冠“姓名已载《会要》，今考其详”；内容是对卷二至卷七中二十八人进行了考述补充；末另行“考详终”。

从此书卷九题目“《书史会要》补遗”审定，不包括“今考其详”

内容。再从“姓名已载《会要》，今考其详”分析，显然与正文非同时所作，其应为《会要》印行后，读者发现问题而进行的考证补充。九成将“补遗”独置后面，原因除资料晚收外，多为影响不大年代不详的书家，若随便插于正文，难免打乱原来顺序。“考详”若是九成同时所作，便没有必要加于后面，可直接充实于原书家条目。若要独立成篇，也不会用“考详”字眼，“考详”是对别人著作而进行的工作。《会要》每卷终，刻有资助刊刻者姓名，而“考详”则无。再从“考详”内容来看，大都考加了书家的籍贯、字号、官职等，且有谬误。如卷四“赵文深”条，谓其“先名文渊，后入唐，避高祖讳，改今名。”是说赵氏活到唐代，为避李渊之讳而改名，这便大错特错。赵氏在后周便卒，是唐初作《周史》者为避讳强改之。从而不难看出，“考详”者，虽然对于原条目有所补益，但也有于历史知识局限而时露马脚。但令人不解的是，陶珙在跋逸园本《会要》时，只注意到了比四库本所多出的书家，而对一节带有明显后补迹象的“考详”反而视而不见，难免有故意隐藏嫌疑。

另外，据陶珙之跋可知，逸园本《会要》为残卷，“惟阙卷首及卷三，复由傅沅叔先生假得全帙付梓。”而所借出自那个版本，情况如何，没作交待，令人颇为迷惑。其还为了证明所印不但是洪武本，而且是初刊本，便用朱印以求其珍，可谓用心良苦。据载，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皆有明洪武本《会要》收藏，南京图书馆所藏本：“（出版人）张璫，字瑞卿，号后山居士。”“《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陶宗仪撰，明洪武九年张璫、卢祥刊”“半页九行，行二十字，黑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sup>⑨</sup>国家图书馆所藏《会要》为“卢祥、林应麟刊。”<sup>⑩</sup>其中出版人颇不一致。细读《会要》刻本可知，除第八卷外，其在每卷终，都附有资助刊刻者，共三十八人。第一卷末附有“后山居士张氏端卿璫，命工锓梓”。第三卷末附有：“卢氏祥夫祥、景云文龙、林氏伯时应麟……（六人）合资助刊”。故知所出现的不同出版人，是对其中资助人取舍不同的缘故。《北京图书馆古籍

善本书目》<sup>⑪</sup>对《会要》其版本有较详细说明：“九卷，补遗一卷，明陶宗仪撰，明洪武九年自刻本，盛昱跋，二册。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此应是杜氏所录者。其中对刊刻人的确定为陶宗仪自刻，颇为合理。对照国家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所藏皆注明为明洪武本的版本并不一样，一为“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另为“十一行，行二十字，”后者与逸园本同。从逸园本页幅看，其上面留白很大，占整面的四分之一，不像初时设计的本来面目，可能是翻刻时为了保持原来行字数而又要增加页行数所致。

## 二

逸园本《会要》，根据什么断定为明洪武初刻本没有详论。从陶珙跋语可知，其最主要理由，就是此版本在元代内容上比四库本多出了许多书家。细读逸园本《会要》元代书家部分，除陶珙在跋中所列比四库本多出的书家外，还多出五位书家<sup>⑫</sup>：在正编黄溍下多出危素；吴睿下多出俞和；张体下多出张瑄；释梵琦下多出释大智；释德祥下多出释来复。一种书的两个版本，出现内容多寡有两种情况：一是内容多者为书之本来面目，缺少者是在重刻中漏掉或有意删去；另内容少者为真，多出者是后刻衍文或有意增添。不能以内容多少论贵贱，应加以考证断真伪。

版本作假，古来有之，至明尤甚，故清儒兴考据学。当代学者程千帆对于版本鉴别总结出十二款，第八“内容”曰：“可以根据书的内容来鉴定版本的同异、真伪、优劣、是非。”中有“据年代例”云：“书本内容中所涉及的年代对我们鉴定版本尤为有用。”“人们都十分注意书籍记事到那一年止。”<sup>⑬</sup>就是说书中所记之事，一定是在著述所限定的时间内，否则便有问题。《会要》从三皇五帝写到元末，作者又是由元入明之人，所以就会出现对元末书家如何断代的问题。纵观正史，对于历史人物的立传，基本上是按其卒年在那个朝代为标准。如杨维桢(1296—1370)，由元入明二年去世，《明史》

便为之立传。读陶宗仪《书史会要》元前篇章，对于书家朝代的划分非常谨慎，完全按此原则编写。五代时较为混乱，遇有不清楚者，便予以说明。如对张徐州、孙昭祚、薛存贵、苏武功记载时，附文：“右自张徐州至此四人，虽皆五季人品，未能详其朝代、世系、爵里，姑存阙疑云。”表现出了“其世所谓良史才”<sup>⑭</sup>的治学严谨之风。

陶宗仪《会要》在洪武九年春杀青封笔，而《元史》早在洪武二年编成，应该说他在对元代人物划分上是有明显依据。考虑到陶氏由元入明的特殊性，可以用比较宽松的准则对待之，即将其完成《会要》之前去世的书家划为元代，不算失误。若将之后还健在者归于元代，不但不符合史家的准则，也有悖于中国人盖棺定论的民族习惯。以此标准来看，四库本《会要》所录元代书家，较为符合，在可查书家中，罕有超越洪武九年以后的情况。较后的唐肃（1331—1374），其卒年为洪武七年，也在陶宗仪完成《会要》之前（其是非后面再论）。再来看逸园本多出的书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胡长孺、周伯琦、胡益、章德懋、熊朋来，袁袞、陆友、罗元、郑瑤、钱良右（佑）、释永芳、释永杰、释大智，以上诸人，有明确纪年及史料证明其为元人者，亦有失考难定者，故不多述。下面重点讨论在明初有活动记载，或有明确生卒记年的书家情况。

明人论国朝初期书法，“（宋）广与宋克、宋璲俱以善书擅名，人称三宋。”（杨士奇《东里续集》）其次“詹（希原）、解（缙）鸣于朝，卢（熊）、周（砥）守于野。”（祝允明《书述》）陈璧学宋克“尝从授笔法”（《松江志》）而大成，皆为明初书法之代表者。杨基、顾禄、钱達、危瓛、张宣、端木智、释来复，皆为明初名士，史料多有记载。他们的活动大都延续到洪武中后期，甚至还长。如端木智以“与修《太祖实录》，擢武库员外郎。”（《解学士集》）就跨过了洪武时代，从元入明三十年以上。若将他们划为元人，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下面有准确纪年的书家：危素（1303—1372），“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明史》）俞和（1307—1382），

“隐居不仕，能诗善书”。(《杭州志》)宋克(1327—1387)，“以善书名天下。”(《明史》)卢熊(1331—1380)，“洪武初名道儒通篆籀学，尝为兗州知州。”(《水东日记》)滕用亨(1337—1409)，“永乐三年被荐召试篆书，作麟凤龟龙四大字，又献祯符三诗称旨，授翰林待诏。”(《延休堂漫录》)宋璲(1344—1380)，“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明史》)朱芾(？—1398)“以翰林院编修改中书舍人。”(《四友斋丛谈》)胡俨(1361—1443)，“永乐二年九月，拜国子监祭酒，”“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正统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明史》)

以上书家，除危素外，都卒于洪武十三年(1380)后。比陶宗仪完成《会要》，最少者也多活了四年。他们多以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步入明朝，且在明初很有名声业绩。滕用亨入明朝时三十一岁，经过了三十八年到永乐三年，以诗、书荐授官。宋璲入明二十四岁，洪武九年六月己丑召授中书舍人<sup>⑯</sup>。此年春，陶宗仪《会要》已完稿，此时宋璲还没授官，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作为前辈的陶宗仪怎能将其归于元代书家呢？更重要的是，比宋璲大三十四岁的父亲宋濂，是明初“文臣之首”，小楷被称为“唐后一人”，<sup>⑰</sup>又是陶宗仪的好友(比陶氏大6岁)，还是《会要》作序者，陶宗仪不可能不把宋濂划在明朝，而将其次子划为元朝人。更有说服力的是胡俨，他出生于1361年，元朝灭亡时为七龄童，《会要》完成时还不足十六岁。陶氏怎能将一个步入明朝的孩提划为元代书家呢？胡俨活了八十三岁，而在明朝度过了七十八年，将这样一位完全成长在明代的重要官员划在元朝，不是极为可笑吗？

至于逸园本《会要》比四库本所多的胡长孺等元代人，也不一定是四库本《会要》漏载者，可能原本没收。这是因为：①陶宗仪对元代书家不一定全部掌握，可能出现漏收现象；②既然收录书家，陶氏心中应有一个标准，古代文人都能用毛笔写字，但不能全视为书家，不符合其标准者不录；③关于书家朝代划分的问题，陶宗仪

严格按史则运作。如杨维桢(1296—1370)是元末明初影响颇大的书家，其入明不仕，二载许去世，逸园本及四库本《会要》都没有将其收录元代，这才是真正的陶宗仪作风，其他可依次类推。《叶德辉书话》云：“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陶九成《说郛》、胡文焕《格致丛书》、陈继儒《秘笈新书》，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窜，信非南村之病。”<sup>⑦</sup>叶氏之论也正为《会要》所出现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九成《说郛》被后人改的面目全非的悲剧，在其《会要》上重演。

### 三

继陶氏《会要》之后，朱谋璽《续书史会要》(简称《续编》)也是重要的书法史著述，皆被清代诸多的书画家类编引用。康熙钦定《佩文斋书画谱》(后简称《书画谱》)是朝廷组织编纂的重要典籍，其对《会要》及《续编》进行了大量选录。将它们进行比较，便发现如下问题：(1)逸园本比四库本《会要》在元代所多出的书家，被朱谋璽《续编》收录为明代者有：危素、危瓘、俞和、周砥、宋克、杨基、陆友、卢熊、宋璲、宋广、陈璧、朱芾、钱達、滕权、端木智、顾禄、胡俨、释大智、释来复等十九人。按理而论，朱为续作，不可能将被《会要》收录的书家重复收录，若将其改动也应有说明。由此推断，朱谋璽所看到的《会要》，便没有逸园本所多出的这些书家；(2)逸园本所多出的书家，《书画谱》全部收录，皆将朱谋璽收录在《续编》者另加张宣共二十人划为明代，而将其余胡长孺、熊朋来、袁袞、郑瑤、章德懋、钱良佑、胡益、罗元、释永杰、释永芳等，划为元代人，进一步说明逸园本《会要》在对多出的部分书家划分朝代上的不合理性；(3)逸园本所多出的书家，被《书画谱》署录《书史会要》(《书史会要》、《续书史会要》旧时统称为《书史会要》<sup>⑧</sup>)条目有二十二人二十三条。其中所录内容出自逸园本《会要》者十八条，他们是：危素、胡长孺、周伯琦、熊朋来、郑瑤、章德懋、陆友、钱達、胡益、

罗元、杨基、宋璲、张宣、朱芾、胡俨、释大智、释永芳、释永杰；取自《续编》者五条，他们是：宋广、陈璧、滕权、释大智、释来复。其中释大智，在元、明重复出现，前者内容与逸园本《会要》同，后者采用《续编》内容。这说明《书画谱》编纂时，一定是参照了两种本子：一为陶氏九卷本《会要》，内容与逸园本相仿；另为朱氏合刻十卷本《会要》，内容与四库本相同。考四库全书的编纂比《书画谱》只晚六十四年，很可能《四库提要》所提到的两种《会要》版本，就是编《书画谱》所用者。为什么四库全书不采用多出书家的另本而采用朱氏合刻本，这应该是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等大儒比《书画谱》主编书画家王原祁等眼力更高明，认为合刻本可靠而另本不可靠的缘故。

细读逸园本《会要》所多出的元代书家，在介绍时非常简单，特别是入明者，在叙述时非常拘谨，很少提及在元代所任官职及事迹。偶尔提及也破绽百出。如谓危素在元代“官至中书左丞”。《明史》危素传，对其所任元代各种官职记载详尽，其中没有任中书左丞之职，却有“除翰林承旨，出岭北行省左丞”一事。<sup>⑨</sup>“行省”是元代地方的政府机构。“中书左丞”权力行使全国，“行省左丞”权力仅限于一省，差别很大。九成博学，又是元末人，决不会出现如此常识性错误。还有逸园本《会要》所多出的书家陆友、钱良右（佑）、钱達、罗元都是平江人，紧排在一起，年辈混乱，其中二钱为父子关系也没注明。显然是后之增文者，根据地方志等采集编入。再则，在比四库本多出的元代书家条目中，议论述说书法缺乏文采，用词欠当。如评周砥书法，“正行草书运笔分布匀稳，殆非一朝夕之功。”论陈璧“真草篆隶，流畅快健，富于绳墨”等，都没有实质性的评论，显得含糊其辞，简陋浅俗，决非九成“学问之精，见识之明”，“文笔简当”“褒贬得平”的笔法。

作伪者为了让人们信其真，还站在陶宗仪的立场上进行了心理推测。如在逸园本中，称元为“大元”，似乎用此表明陶氏以遗民身份处世。其实适得其反，陶宗仪虽然入明不仕，但对明朝并不怀

抵触情绪，他不愿在明朝为官，是因为他在元朝便绝意仕途。他曾在洪武二十九年，率领弟子赴礼部试读《大诰》，并得以赐钞归，<sup>②</sup>便可得到证明。再者，陶宗仪《会要》的付梓虽然不是政府行为，但从《会要》作序人宋濂、曹睿等看，不是朝廷名臣，就是地方大员。都说明陶宗仪不是不与明朝廷来往，而且关系颇为密切。若陶宗仪刻书还称亡元为“大元”，关系到政治问题，作序的官员们不敢随声附和。从而推知，作伪者将元末明初的一部分书家归于元代，也是想表明陶氏的怀旧心理，来赢得人们的坚信不疑，以致弄巧成拙。

因此可下结论，逸园本《会要》决非洪武真本。其中比四库本所多出的书家，是重刻者按照自己意愿一次或几次增加所致。至于篡改的时间，其前限应是胡俨去世的正统年间。嘉靖时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有：“《书史会要》中，评朱（芾）沧州为风度不凡，陈（璧）谷阳为富于绳墨”<sup>③</sup>之语，运用了逸园本之论，说明此本在嘉靖前便流行。故可定其下限为嘉靖年间。另外，四库本《会要》元代末尾部分，书家的排序也较乱，人选亦不严谨，如武洪七年去世的端木智也被归为元代。对部分书家的评论浅陋，与九成见识颇有距离。故怀疑其非陶宗仪原貌，似亦为被篡改了的本子。

应该说明的是，逸园本《会要》虽不是洪武真本，但并没有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它的出现毕竟为我们研究书法史增添了参考比较资料，为补正四库本之错误，也提供了诸多依据。只要我们在使用上进行必要的选择甄辨，对我们研究书法史会有帮助的。

## 注：

①昌彼得：《说郛考》，台湾文史出版社，1979年。

②③余绍宋《书画书目解题》卷一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⑤《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⑥四库全书本《书苑菁华》645、6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⑦⑧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⑨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排印本，1983年。

⑩⑪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134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⑫讨论所用逸园本《会要》为“己巳夏武进陶氏逸园景刊洪武本”；四库本为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中《书苑菁华》所收《书史会要》及《书史会要续编》，文中所引皆出于此。

⑬程千帆《校雠广义》（版本编）371、372页，齐鲁书社，2001年。

⑭孙作：《南村先生传》，见《中国书画全书》9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⑮清·谈迁：《国榷》，535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⑯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24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⑰《叶德辉书话》18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⑱《谈〈书史会要〉与〈续书史会要〉》，见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22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⑲《明史》7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⑳《明史》7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㉑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251页，中华书局1997年。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

## 新书讯·《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文禄堂书影·宋元书式》

《珍稀古籍书影丛刊》之三（之一为《铁琴铜剑楼书影》，之二为《盍山书影》）。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陶湘编，民国二十六年影印一辑收书影二十三种；二辑收书影十六种。《文禄堂书影》，王文进编，民国二十六年影印。收书影五十种。《宋元书式》，佚名编，民国间印行。收书影一百四十二种。全书精装16开，定价290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